

事变桥梁沟卢

与八年抗战

杨成武

主編 張春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编

北京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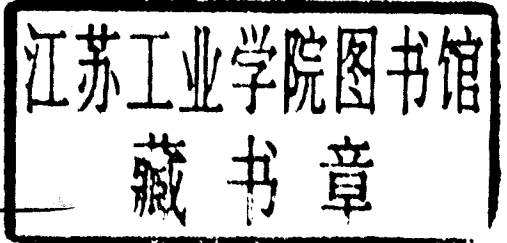
K265
46
2

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

主编 张春祥

抗日战争纪念馆编

北京出版社



卢沟桥事变与八年抗战

lúgōuqiáo shìbìàn yǔ bāniǎn kàng zhàn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京怀柔东晓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印张 336,000字

1990年10月第1版 199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00—01246—7/K·112

定 价：5.45元

目 录

编辑说明	抗日战争纪念馆 (1)
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华北驻屯军	武月星 (1)
卢沟桥事变的几点认识	齐福霖 (29)
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	曾景忠 (39)
简论卢沟桥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端	温贤美 (57)
卢沟桥事变战场考	郭景兴 (63)

大敌当前的抉择——“七七”事变

前后国共关系的演变	何仲山 杨圣清 (77)
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共关系	郑则民 (93)
论卢沟桥事变前后的国共两党关系	毛 磊 马德茂 (108)
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民族关系述论	杨 策 彭武麟 (121)
蒋汪关系与华北危局	马振犊 (135)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平

地下斗争	王汝丰 荣国璋 (150)
北京地区抗日根据地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孔宪东 (166)

从“九一八”到“双十二”蒋介石的对日基本

政策和处理内政外交关系的根本原则	王桢林 (178)
“七七”事变前中国国民党的对日战略	罗焕章 (193)
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的态度及对策	肖 牲 (206)

试论平津之战	马仲廉	(220)
试评抗日战争时期的正面战场	杨圣清 何仲山	(234)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持久战略之比较	王树荫	(249)
国民党抗日游击战场初探	韩信夫	(263)
“七七”事变后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总枢纽——华北		
开发会社的设立及其活动轨迹	解学诗 宋玉印	(280)
中国抗日战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贡献	刘建业 段晓薇	(307)
卢沟桥事变与张自忠	殷 廉	(331)
抗日名将罗芳圭	王玉成 邱 锦	(346)
冯治安与抗日战争	吕乃澄	(356)
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张注洪	(365)
迟到的信息——卢沟桥事变50周年		
日中学术讨论会评介	王汝丰	(387)
海峡两岸有关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状况和		
几个问题	成汉昌 刘 侃	(401)
当前日本政界和现代史学界在研究现代史方		
面的某些动向	郭彬蔚	(419)

卢沟桥事变前的日本华北驻屯军

武月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距今已52年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外的学者论述和研究卢沟桥事变的史著很多，一些正直的学者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进行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谴责，对卢沟桥事变发生、发展的过程，从各个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和探讨。但遗憾的是，其中也有一些学者在分析中日战争起因时，忽视了对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实力和活动的研究，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中日战争的真正起因，自然也就作不出客观公正的、有说服力的论断。笔者认定，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当局蓄谋已久而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由驻中国华北地区日军挑起的。本文根据个人涉猎到的史料，试图对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由来、编制及在华北的活动作些探讨，就教于各位史学界的先进。

一 驻屯军的由来

外国军队可以在我国华北驻防，始于1901年9月7日清朝政府与英、俄、日、德、法、美、意、奥、比、西、荷等十一国公使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该约共12款，带有19个附件，它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清政府在第7、第9两款中，给了上述国家在中国的驻兵权。第7款条文为：“大清国国家允定，各使馆境界，以为专与住用之处，并独由使馆管理，中国人民，概

不准在界内居住，亦可自行防守。使馆界线，于附件之图上标明如后（附件十四）：东西之线，系崇文门大街，图上十、十一、十二等字，北面图上系五、六、七、八、九、十等字之线，西面图上系一、二、三、四、五等字之线，南面图上系十二、一等字之线。此线循城墙南址随城垛而划，按照西历1901年正月16日，即中历上年11月26日文内同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①第9款：“按照西历1901年正月16日，即中历上年11月26日文内后附之条款，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②。”

上述两款对参予侵华战争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驻兵地区和驻兵权限都作了明确规定。这样，外国侵略军不仅控制了京津地区，而且，从渤海湾到北京城的通道也完全处于外国军队控制之下。从此，北京大门洞开，侵略军随时可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置清庭于帝国主义武装力量的监督之下，使其屈从于它们的旨意。同时，又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冲直撞，直接镇压中国人民。

条约中对各国在华驻兵人数虽没有规定，但在同年4月6日，八国联军指挥官曾共同协商议定：北京使馆卫队，总人数不得超过2100人；北京至山海关的通道上，驻军总人数不得多于6200人，其中，天津驻扎2000人，山海关和秦皇岛驻1500人，其余的2700人分驻其他九处，每处300人。撤兵期间，各国驻兵总数额12200人，③到各国军队撤退完毕，恢复正常秩序之后，驻兵总数以8200人为限（占撤兵期间驻兵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强），各国不得超过2000人。④北京至山海关沿线十二处驻兵情况是：天津，由英、法、德、意、日五国分驻，黄村驻意军，廊坊、杨村驻德军，军粮城、塘沽驻法军，芦台、唐山驻英军，滦州、昌黎驻日军。⑤

在华北的外国驻军中，以日本的驻军总数为最多，有1650人，占驻军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美国人数最少，计150人，奥国其次，200人，美奥两国只驻兵北京，保护使馆。⑥日本仅北京使馆区就驻有400人，其余的1250人驻扎在战略要地天津、塘沽、秦皇岛、山海关等处。这数目近2000人的日本驻军，在各驻守地耀武扬威，象一只登堂入室的恶狼，时时威胁着华北地区的安全。

《辛丑条约》签字之前的两个月，日本以“护路”、“护侨”为名，向中国派遣了驻屯军，命名为“清国驻屯军”，第一任司令官是大岛久直中将，总兵力约2600人。⑦签约后一个多月，即10月24日，日本政府正式规定的清国驻屯军的编制是：驻屯军司令部，北清驻屯各部队及上海驻屯步兵大队。其职能为负责“保护帝国公使馆、领事馆及帝国臣民”。9月签约之后，驻屯军司令部移驻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司令长官改由山根武亮少将担任，兵营分两处，一是天津海光寺，一是北京东交民巷。以后30余年间，历任司令官有23人，除了两名大佐外，其余的都有少将或中将衔。他们是：秋山好古骑兵大佐、仙波太郎步兵大佐、神尾光臣少将、中村爱三少将、阿部貞次郎少将、佐藤钢次郎少将、奈良武次少将、斋藤季次郎少将、石光真臣少将、金谷范三少将、南次郎少将、铃木一马少将、吉冈显作少将、小泉六一中将、高田丰树中将、新井龟太郎中将、植田谦吉中将、香椎浩平中将、中村孝太郎中将、梅津美治郎中将、多田骏中将、田代皖一郎中将、香月清司中将。⑧

日本驻屯军的兵力也在不断的变化。从1908年起，北京设一个步兵中队，天津设两个步兵中队。到1909年，日本政府为节约经费，曾缩减了兵力，但到了1911年，又增加了北清派遣队，计步兵一个大队，机枪六个队。⑨1912年，陆军将清国驻屯军更名为“中国驻屯军”，因为司令部在天津，又称“天津驻屯军”，我国通常通称其为“华北驻屯军”。

天津驻屯军是日本设在国外的四大常备兵团之一（其余三个

是朝鲜军,台湾军,关东军),直属日本陆军部领导,编制与司令官的任免也直接由军部决定。其组织机构有驻屯军司令部和驻屯军部队。驻屯军司令部是日本政府设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最高军事机关,人员除司令官一名外,还设参谋长一名,高级参谋和副官多人。驻屯军部队包括步兵队,守备队与宪兵队,其指挥机关是步兵队队部。步兵队是驻屯军的主力,由步兵中队和小队组成。1936年以前,驻屯军在北京和天津各设一个队部。

二 肆意违约的强化

日本根据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对华北侵略的需要,既依据《辛丑条约》在华北驻兵,又不遵守《辛丑条约》的有关限制,随意改变驻屯军的编制,增加驻军人数,并相应调整司令部权限,实现天津驻屯军的强化。

从1911年10月10日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时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不断寻找机会,要求增加兵力,并不时地唆使在华北的驻屯军制造纠纷,干涉中国内政,以期获得新的权利。

武昌起义,世人瞩目,而最关心这件事的当数日本。它不仅局限于中国局势混乱时期确保已经到手的在华权益,而且时时觊觎,要乘机进一步获得新的特权。为此,日本政府下定决心:即使出动武力干涉,也在所不惜。于是,日本以确保在武昌对岸的汉阳铁矿为借口,派遣军舰,在长江下游监视革命军的行动。只因为列强的干涉,美国提出强烈的抗议,英国也坚决抵制,日本才不得不在10月22日发表声明说,“出动军舰的目的仅为保护日本侨民。”在这种形势之下,一时不便再有所行动。^⑩虽然日本的军事行动受到列强诸国的牵制,但实际上还是强烈地表现出了它的意向。10月末,河北省滦州的清军将领张绍曾表现出有响应革命的动向,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唯恐本国在华北的利益受影响,

曾于10月27日、28日、30日先后三次致电日本政府，要求从日本本土派遣陆军、海军到天津、塘沽、秦皇岛等地维持治安。^①

在武昌起义之前上台的西园寺公望内阁，已决定了对中国革命采取“介入干涉”方针，以便趁此时机，扩大日本的在华权益。西园寺公望对中国问题较为陌生，内阁在对中国问题上的决策，实际上依靠内相原敬、外相内田康哉。内田康哉1901年至1906年出任过驻清国公使，在北京居住多年，是一个中国通。他与日本政坛元老、陆军巨头山县有朋关系甚为密切。当时，陆相石本新六也以“保护在满蒙权益，维持对朝鲜控制”为理由，要求往中国华北地区增派两个师的兵力。^②内田受这种关系的影响，内心同意派兵，但顾虑到英美的态度，口头上主张采取慎重态度。他给伊集院彦吉回电说：“日本派兵，将会引起各国顾虑，而且还会给革命党以非难日本政府援助清廷的借口。这件事，至少要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与谅解，纵使问题国际化，也可以由两个共同负起责任。”^③这个电文，充分显示出内田康哉的真实心情。伊集院彦吉收到外相的电报，马上以“确保铁路安全”为借口，同英国公使朱尔典协商派兵问题。为了英国的在华利益，朱尔典对增兵表示支持，提出由有关国家组成联合部队共同防护京津铁路。接到伊集院彦吉的报告，日本外务省要求驻英国大使探询英国真实意图，同时建议护路扩大到京奉（北京到沈阳）铁路，但山海关以北由日本单独负责，不必共同防护。英国政府怕因此引起国际纠纷，建议由公使团协调之后，再行实施，但日本不等公使团磋商，于11月11日单独决定派500人“护路”。日本的行动，引起俄国的不满，俄国驻伦敦大使对英外相声明：“对于日本的独占行动，俄国不能坐视不问”。^④由于俄国的强硬态度，英国拒绝了日本的行动建议，日本的派兵计划没能实现。

但日本并没有因为英俄的牵制而放弃派兵计划，仍要求在山海关内护路，并希望英国承认山海关外的铁路由日本单独“防护”。

此时，美国、德国也表示要分享在中国的“护路权”。英国认为时机成熟，对日本表示：关外的铁路，在与俄国商洽之后，可以由日本单独“防护”。山海关以内的铁路，由其他国家分段“保护”。在利益均占的前提下，1912年1月，由英、美、法、德、日、俄六国签定《防护铁路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取得了从山海关到滦州长达61公里铁路“防护权”，从此，日本在这一地区增派了559名驻兵。⑮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恐吓北京政府，在3月10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中国动用武力，计划派遣30000人到中国。⑯1925年，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建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日本却加强了对华侵略布置，将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再次升格为中将级，派小泉六一中将任司令官，此后，连续四任均为中将级。驻屯军人数，也由1924年的737人，增加到1927年的1347人，增长将近一倍。⑰1927年，天津驻屯军的编组也有改变，驻屯军由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天津驻屯步兵队（队部及步兵四个中队），北京驻屯步兵队（队部及步兵一个中队）、中国驻屯军医院等组成。⑱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之时，日本又酝酿增兵“保侨”。至1930年底，日本政府由于集中力量，加紧策划，对我国东北的更大规模占领，才把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级别又降至少将，但驻屯人数却仍在增加。之后华北驻屯军除了原有部队之外，又配属了一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包括队部、步兵两个大队、工兵小队、通信队、野炮兵中队、卫生班），主要布置在天津以北、以东的铁路沿线，担任警备。⑲

1931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天津驻屯军与其呼应，制造了“天津事变”。11月8日，天津驻屯军会同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在天津唆使汉奸、杂牌军人李际春、张璧，纠集流氓兵痞，组成1000余人的便衣队，在日租界分发枪械，冲入华界扰乱治安，并不断地向驻天津的中国军警发动武装挑衅，中国军警出动

镇压暴乱，日本驻屯军就出来干涉。他们断绝了日租界地与华界的交通，封锁了溥仪的住地静园，炮轰中国军警，强迫后撤。为了扩大事态，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发表声明说：“日本军队业已采取种种方法，以保护日本权力之安全。”^②并出动日军占领天津二区警察所。11月11日，溥仪在土肥原策划下，换上日本军服，化妆、坐车逃出静园寓所，从码头乘日本汽船到营口，先被安顿在旅顺，后被运至长春作为伪满皇帝，成了日本的傀儡。香椎浩平还借机提出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的无理要求。华北驻屯军的挑衅活动引起了英、法、意等国驻津司令的反对，他们向香椎浩平提出警告，要求日本遵守条约，免起衅端。而国民党政府，却屈从于日本的压力，于11月29日命令中国的天津驻军后撤。

天津驻屯军与关东军是驻扎在中国领土上，奉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意志的两支暴虐势力。关东军建立之后，在侵华的道路上，他们关内、关外遥相呼应，相互勾结，在中国的领土上为非作歹，不断挑起冲突，制造暴乱，大肆掠夺中国的资源，对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为了实现独占中国的野心，日本关东军在侵占我国东北之后，势力就逐渐伸向华北。1月，侵占山海关；3月，占据热河；3、4月份，又进攻长城各口。5月下旬，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与中国华北军代表熊斌签订《塘沽协定》时，华北驻屯军紧锣密鼓，积极配合。天津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和驻北平武官永津佐比重对中国军队进行收买、分化和策反，长城战役发生时，中村少太郎（当时任天津驻屯军司令）也嗾令便衣队扰乱后方，并千方百计地促成《塘沽协定》的签订。《塘沽协定》的签订，说明国民党事实上已经公开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占领，并进一步承认河北东部一带为非武装区。从此，长城以北的东北各地尽失，整个华北处于日军的监督之下。

夺取华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为此，日本华北驻

屯军采用各种方法，向我国步步进逼，造成了华北地区日军日特横行的乌烟瘴气局面。仅1935年，日本侵略者就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1月）、热河事件（5月）、何梅协定（6月）、秦土协定（6月）、香河自治运动（9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建立（11月）、冀察两省特殊化事件（12月）等，所有这些，其分化手段虽不同，但割裂中国主权的目的是——企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日本天津驻屯军在华北地区无恶不作：制造傀儡组织，掩护走私活动。他们手段毒辣、凶狠狡诈，很受日本政府的青睐。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因迫使中国签订“何梅协定”，逼中央军退出冀察地区，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和平津的党部，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继任多田骏少将，由于参予协商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推行“华北自治”，炮制冀东伪组织而受到奖赏，擢中将回国。

随着日本驻屯军侵入中国腹地，日本特务机构也在华北的一些战略要地相继建立。北平、天津、保定、唐山、济南、青岛、太原、归绥、张家口等地的特务机关，都直接受天津驻屯军领导。仅在天津的日租界内，就有许多由日本军人主持的称为“公馆”、“洋行”的特务机构，他们的总目的是配合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但具体任务又各有侧重。如位于淡路街的“青木公馆”，由大通道贞中佐主持，任务是侧重于鼓动冀东“独立”及拉笼北洋军阀吴佩孚组织华北伪政权；在曙街的“斋藤洋行”，由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柴山兼四郎主持；任务是收买笼络“九一八”事变后由东北来天津的军政要员；在伏见街的“和知公馆”，由驻屯军高级参谋知鹰二中佐主持，任务是策动两广及山西独立；设在路街的“茂川公馆”，由茂川秀和少佐主持，任务是配合日军占领平津的军事行动和组织伪政权；设在石山街的“三野公馆”，由驻屯军参谋三野友告主持，负责制造便衣队暴乱活动及监视控制清逊帝溥仪的行动。这些日本特务机关，由军人主持，秉承驻屯军的指令进行活动，是华北驻屯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5年5月17日，日本的驻北平公使馆升为大使馆。此后，日本的驻华武官和天津驻屯军就不断以各种名目为借口，向东京政府要求扩大驻屯军编制，增加兵力。9月，多田骏以“保侨”为名，要求东京增兵华北。12月13日，多田骏又召集幕僚开会，制定了一个扩编增员方案，呈报东京军部。1936年1月10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武藤课长于晋谒陆相川岛义时，曾说明军部与天津驻屯军之间已协商达成两点：“一、驻屯军司令官应由少将级改为中将级，二、驻屯军司令部应仿台湾军司令部扩充”。^②此后，天津驻屯军的名称改为华北驻屯军，作为武装侵略华北的最高机关。驻屯军编制的升格，是日军侵华步伐加快的一个重要标志，显示了驻屯军的活动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平津地区，而扩展到整个华北了。“二二六”事件之后，日本建立了军部独裁政权，首相广田弘毅将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权限范围作了明确划分：长城以外（北）地区，由关东军负责管辖，长城以内（南）地区事务，由华北驻屯军处理。日本政府这样安排有两个用意：一、提高华北驻屯军的地位，使其“有独立处理华北中日间有关事务的权力”，^②二、让“急进的关东军不再干预，专心致志进行对苏战备。”^③1936年3月下旬至4月初，日本驻华武官矶谷廉介，与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永见俊德又分别向东京参谋本部提出增兵华北的建议和“强化华北驻屯军”的方案。对此，日本政府非常重视，于4月17日，广田内阁会议正式通过增兵6000人的决议，^④并得到天皇裕仁批准。4月28日，内阁发布第六号军令，将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军部任命改为“亲补职”——由日本天皇直接委任，并增强约三倍的兵力；同时将驻屯军的一年交替制改为永驻制。显然，这是提高驻屯军地位，加强驻屯军权力的重要措施。5月1日，裕仁天皇亲自任命田代皖一郎为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其人城府很深，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侵华老手，而且是日本军界公认的侵华派首脑人物。他在“一二八”上海战役时，以中将衔出任侵华司令官白义川则的参谋

长。

增兵华北的日军，分别在5月9日、10日从于品港，22日、23日从新泻港上船运往中国。5月15日，首批新增日军3000人到达平津。^{②5}16日，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把他的旅团部设在北平。新增日军以如此大的数量开进中国，使国民政府万分惶惑和焦虑。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倭寇在华北增足一旅兵数，北平乃为其无形之占领，将来收复更费心力矣！北平文物或将由此为倭寇灭矣！”^{②6}到了6月下旬，增派日军全部抵达平津各地。至此，“强化华北驻屯军”新方案完成。据东京日本政府宣布，增兵人数为6000人，连同原来驻华北的2400人，合计为8400人。^{②7}其实，日本增兵华北人数远不止此，据上海申报1936年9月的调查：华北驻屯军的人数已超过14000人，分驻于天津、北平、丰台、通州、山海关、秦皇岛、南大寺、唐山、塘沽、昌黎、湾东、留苏营及北宁路沿线各站。金曼辉说他依据多方的消息，日军“在5月以前原有驻军8000名，5月以后陆续增加到16000余名，至二十六年（1937）春交替结果，实数已超过20000人。”^{②8}

人数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事，这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目标。因为有了足够数量的兵力，就可以为所欲为地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正因为如此，日本当局对这一时期的华北驻兵人数讳莫如深，有人问到新增的驻军人数时，驻屯军参谋今井武夫回答说：“日军增加的数额，不便奉告。”但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增派日军的编制，配备情况与战斗力。新增日军为战时编制，在驻地还大量修建炮台，驻守地为平汉、津浦、北宁、平绥等铁路沿线。下面根据申报每周的增刊公布的调查材料，^{②9}列表统计如下：

“强化”后的华北驻屯军编制，其规模是庞大的，除拥有一个旅团的步炮联队（计3个中队）外，还有航空大队、骑兵大队、机器化学兵大队、工兵中队和驻防在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宪兵队，再加上设在华北15个主要城市的特务机关、冀东的伪军、日本浪

表一 军部机构

职官设置	将 领	职 能
司令官	香月清司中将	是华北驻屯军的最高指挥官，管辖驻屯军，处理中日间有关事务。
参谋长	桥本群少将	
参谋部代主任	塚田中佐	
参谋部第一课课长	大本少佐	办理军事、战斗、风纪、军纪等事。
参谋部第二课课长	和知中佐	办理情报、新闻、宣传、特务等事。
参谋部第三课课长	田塚中佐	办理经济、开发、资源调查等事。
参谋部第四课课长	长岭中佐	操纵控制冀东伪组织活动，为其扩大机构，搞活动，进行谋划。
参谋	安达少佐、浅进少佐 专田少佐、甲斐少佐	
副官部主任	河田槌太郎中佐	
军医部主任	桃井直干一等军医正	
经理部主任	今村一等主计正	
兽医部主任	福井一等兽医正	
翻译部主任	中川一等翻译官	
经济顾问部主任	参谋村义秀中佐	主管经济事务，执行和设计“经济计划”。

续表

情报系主任	参谋石井嘉惠中佐	
调查班班长	参谋中村忠雄少佐	
通讯班班长	高级副官大竹修夫少佐	
驻平特务机关长	部附松室孝良少将	
驻平特务副机关长	部附滨田弘少佐	
驻太原特务机关长	部附和所鹰二中佐	
驻绥远特务机关长	部附羽山喜郎少佐	
驻通州特务机关长	部附上野大尉	
驻天津特务机关长	部附边崎大尉	
副官	佐木大尉、部附铃木少佐、中村少佐、中岛少佐、松井大佐、	
副官	河野中佐、羽山中佐、谷获少佐、石野少佐、大木少佐、奇平大尉、今井少佐	

附记：

1. 田代皖一郎司令官于1937年7月11日晨病死，当天午后四时，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乘飞机由日本到天津。过锦州时，关东军飞机12架护飞前往。当天下午六时半，香月清司就职上任。
2. 华北驻军人数为8400到20000人，说法不一。